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之二—— 历时研究方法

张玉全 教授

提 要 出土文献语言历时演变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用的语料是出土文献，由于所使用的语料的特殊性，这种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探讨了出土文献语言历时演变研究的特殊性及其理论方法。

关键词 出土文献 历时演变 理论方法

目录

一、历时研究的基础

二、历时研究的语料

三、历时研究的课题

四、历时研究的理论方法

一、历时研究的基础

历时研究要在断代描写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

（一）汉语历时研究

要在断代描写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一般是先进行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的断代描写研究。例如：

徐志林的《汉语双宾句式的历史发展》（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主要包括这样五章：

第一章：上古汉语双宾句式

第二章：中古汉语双宾句式

第三章：近代汉语双宾句式

第四章：现代汉语双宾句式

第五章：总结

张延俊的《汉语被动式历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主要有这样几章：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汉语被动式的特点、类型及用途

第三章：远古（殷商至西周）汉语被动式

第四章：上古（春秋至西汉）汉语被动式

第五章：中古（东汉至隋代）汉语被动式

第六章：近古（唐代至清代）汉语被动式

第七章：汉语被动式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机制和规律

梁银峰《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学林出版社 2006）主要有这样几章：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泛动补结构形态——先秦秦代

第三章：动补结构的酝酿期——两汉

第四章：动补结构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

第五章：动补结构的普遍运用期——隋至宋金

第六章：动补结构的成熟期——元明清

第七章：结束语

（二）上古汉语历时研究

例如研究上古汉语语法发展史，可把上古时期分为殷商（253年）、西周（275年）、春秋（294年）、战国秦代（269年）、西汉（231年）等五个时段，先利用出土上古文献分别描写各个时段的语法系统。在把各个时段的语法系统描写出来之后，再用“史”的线索把它们串联起来，考察从殷商至西汉时代语法系统的演变，并探讨其演变的原因及规律。

一些研究成果的介绍：

张玉金《出土先秦文献虚词发展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第一章 出土先秦文献介词的发展

第二章 出土先秦文献连词的发展

第三章 出土先秦文献助词的发展

第四章 出土先秦文献语气词的发展

第五章 出土先秦文献兼词的发展

第六章 出土先秦文献虚词发展综论

（三）上古汉语各个时段的历时研究

1. 殷商时段：

甲骨断代学与殷商汉语的历时研究。

2. 西周时段：

西周金文分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

3. 春秋时段：春秋金文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

4. 战国时段：战国金文分为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代。

5. 西汉时段：也可以分期。

二、历时研究的语料

（一）出土文献的语料价值

笔者（2017）在《出土文献的语料价值》一文中，谈到出土文献对于汉语史、古代汉语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首先，出土文献时代、地域明确。研究汉语史和古代汉语，首先要弄清楚汉语发展史中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语言面貌，所以要求所使用的语料要时代地域都明确。不少传世古书的年代和地域存在疑问，学术界争议很大，使用这样的语料难以达到研究的目的。

其次，出土文献保持语言原貌。研究汉语史和古代汉语，要求所使用的语料要保持语言原貌，而不能有错误，不能有后代语言现象的掺入。传世文献，如《尚书》、《诗经》、《左传》、《墨子》等等，经过长期流传、反复传抄、屡经校勘、多次刊刻，难免失真。而出土文献，长期被掩埋在地下，未经流传，能够真实地保留当时语言的面貌，具有珍贵的语料

价值。

我们拿楚简《老子》和今本《老子》（用的是王弼本，即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做比较，来看看传世《老子》在流传过程中的失真情况。仅比较两个本子中的部分文字：

楚简甲本《老子》：江海（海）所以为百浴（谷）王，以其能为百浴（谷）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圣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才（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才（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才（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詘（厌）。以其不静（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臯（罪）莫厚害（乎）甚欲，咎莫僉（憊）害（乎）谷（欲）得，化（祸）莫大害（乎）不智（知）足。智（知）足之为足，此互（恆）足矣。

王弼本《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进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一句（每句以句号为界，下同）：今本在“为百谷王”前加“能”，在其后加“者”，把“能为百浴下”，改为“善下之”，把“是以”改为“故”。

第二句：楚简本先说“前”“后”，后说“上”“下”。今本则相反，先说“上”“下”，后说“先”“后”（把“前”改

为“先”)。今本又在句子前加了“是以”。

第三句：楚简本说“民弗厚”，今本说“民不重”；楚简本说“民弗害”，今本说“民不害”。

第四句：今本在“天下”前加“是以”，而且把“弗”改为“不”。

第五句：今本“不争”下脱“也”字。

第六句：今本脱掉“臯(罪)莫厚嗜甚欲”一句，而且后两句还颠倒了次序，先说“祸”句，后说“咎”句。楚简本用“乎”，今本用“于”；楚简本用“僉(憊)”，今本用“大”。

第七句：今本“知足”前加“故”，“知足之”后脱“为”，后一小句前今本脱“此”字，又把“恆”改为“常”。

可见，与传世文献《老子》相比，郭店楚简《老子》更接近其原貌。

(二) 以出土文献为基本资料，以传世文献为旁证

研究汉语史，要注重“二重证据法”，要将“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结合起来。

1. 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

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提出了“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两个概念，前者大致相当于出土文献，后者大体相当于传世文献。他说：

“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甲骨、金石、木简等，还

有作者的手稿是这一类……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资料的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都是后时资料，它们特别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根据常识来说，应该是以同时资料为基本资料，以后时资料为旁证，但没有同时资料的时代就只有根据例子的多寡和时代前后的状况如何来推测，这样还得出不出明确的结论。”

2. “出土文献”并不都是“同时资料”

黄德宽先生（2017）在《汉语史研究要避免落入新材料的陷阱》一文中指出：

“语料的选择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近出一些汉语史研究论著中，有些学者认为战国秦汉简帛等出土资料大体上相当于‘同时资料’，并基于这种认识来讨论上古汉语史的有关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许多出土文献应属于太田辰夫所说的‘后时资料’。

从战国秦汉简帛**书籍形成**的角度看，受制于材料的限制，当时的书籍形态与后世并不一样，大多数书籍本来是分篇单行的，当汇集单篇成书时，各篇编次先后和内容多寡会出现差异；从**流传的过程**来看，这些文献大都经历过复杂的传抄过程，有的甚至经过口传转写，不同时期的传抄者对文本进行增删改造时有发生。

因此，新发现的战国秦汉简帛资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同时资料’。只有墓主人下葬时的遣策以及那些未经传抄的应用性文书等，才可能是较为明确的‘同时资料’，如战国包山楚墓遣策、文书、卜筮祷祠记录等。新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文献类材料，一般都经过传抄甚至口传，只能是地下出土的‘后时资料’，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古籍文献，大都是典型的‘后时资料’。

对这些出土文献的形成和性质有的学者未作深入分析，以简帛抄写时间作为语料的年代，如将上博简、清华简作为战国中期或中一晚期的材料。实际上，清华简中《尚书》类文献形成的时代显然在西周时期。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资料中，有许多应该早于墓葬和抄写的年代，作为语料使用时对其时代的判断也要做具体分析。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臆兵法》《晏子》《六韬》《尉繚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文献，由于出土这批简的汉墓下葬时间在武帝初年，这些文献抄写年代基本可以确定在文、景到武帝初年。虽然这些文献成书年代难以确定，但它们大多形成于战国时代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运用这些出土文献材料时，有的研究者将银雀山‘全部简文都看做秦汉时期的语言材料’，根据这一认识，进而得出‘秦汉时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是非常接近的’这样重要的结论。虽然不能排除银雀山汉墓文献在流传和传抄过程中

受到秦汉时期语言发展的某些影响，但是将银雀山汉简直接作为秦汉时期的语料，并依此得出一些关于秦汉时期汉语特点和发展的结论，显然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三）上古汉语发展研究所使用的语料

参见高小芳等的《汉语史语料学》，多可商榷。

如果研究上古汉语虚词的发展，先利用出土上古文献分别描写各个时段的虚词系统，然后再用“史”的线索把它们串联起来。

1. 描写殷商时段虚词系统时使用的出土文献有殷墟甲骨文、殷代金文。

关于《尚书》里的《商书》（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2. 描写西周时段虚词系统时使用的出土文献有西周金文、西周甲骨文。

上博楚简《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清华竹简《尚书》、阜阳汉简《诗经》（雅颂）、安大简《诗经》（雅颂）。

用来进行比较的传世文献有《易经》（卦爻辞）、《诗经》（雅颂）、安大简《诗经》（雅颂）、《尚书》（14篇）、《逸周书》（9篇）等。

《周礼》是否西周文献，尚待研究。

3. 描写春秋时段虚词系统时使用的出土文献有春秋金

文、秦公大墓石磬文字、石鼓文、侯马盟书、温县盟书。

阜阳汉简《诗经》（国风）、安大简《诗经》（国风）、武威汉简《仪礼》、马王堆帛书《易传》。

用来进行比较的传世文献有《春秋》、《诗经》（国风）、《尚书》（2篇）、《易传》、《仪礼》等。

《老子》、《孙子》、《论语》、《左传》、《国语》是否春秋文献尚待研究。

4. 描写战国秦代虚词系统时使用的出土文献有：

战国秦代金文；

战国秦代简牍文字（包括信阳楚简、五里牌楚简、仰天湖楚简、杨家湾楚简、望山楚简、九店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新蔡楚简、香港中大楚简、清华楚简、睡虎地秦简、睡虎地秦牍、青川秦牍、放马滩秦简、岳山秦牍、龙岗秦简、周家台秦简、里耶秦简、北大秦简、曾侯乙墓竹简等）；

战国帛书（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

战国秦代玉石文字（包括秦駟玉版铭、行气玉铭、玉璜箴铭、守丘石刻、诅楚文、岫嵎碑、峯山刻石）等。

郭店楚简《老子》、北大汉简《老子》、马王堆帛书《老子》、定州汉简《论语》、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马王堆帛书医书。

用来进行比较的传世文献有《老子》、《孙子兵法》、《左传》、《国语》、《论语》、《墨子》、《战国策》、《庄子》、《韩非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礼记》、《公羊传》、《谷梁传》、李斯文等。

5. 描写西汉时段虚词系统时使用的出土文献有尹湾汉墓简牍、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前两种全部采用，后五种部分采用）等等。

用来进行比较的传世文献有《新书》、《新语》、《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盐铁论》、《新序》、《说苑》、《列女传》等等。

语料整理：要收集齐到目前为止发表的所有出土上古文献，从文字考释、词语训释、语句通释、思想内容、时代性和地域性等方面概述前人和时贤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并形成自己的见解。

三、历时研究的课题

（一）分段描述各个时段的状况

把上古时代分成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五个时段；利用出土上古文献，用统一的理论框架描写每个时段的虚词系统，弄清楚每个时段到底有多少个虚词、每个虚词

的词性、意义、用法及地域性如何、该怎样归类等；对所遇到的疑难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如上节课提到的断代研究成果。

（二）描述发展的具体状况

如研究出土先秦文献介词的历时演变：

介词是一个系统，其中还包括一些子系统，如主事介词、客事介词、与事介词、凭事介词、境事介词、因事介词、关事介词、比事介词等。

但是这些子系统并不是一开始就都有的，而是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就殷墟甲骨文来说，当时还没有凭事介词、因事介词、比事介词等。这些子系统是从西周时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

早期即使有某个子系统，也不太发达，其中包括的介词也比较少。比如殷商时代客事介词只有一个“于”，到了战国时代，则增加了“以”“自”“到”三个。

就出土文献来看，上述 32 个介词的出现和使用时代是不同的。如下表所示：

时代	殷商时代	西周时代	春秋时代	战国秦代
虚词				
於（于、乎）	○	○	○	○
以		○	○	○
用		○	○	○
如				○
与				○
及	○	○	○	○
累（暨）	○	○		

为				○
因				○
自	○	○	○	○
从	○	○	○	○
由	○	○	○	○
道				○
至	○	○	○	○
到				○
遽				○
晋		○		
讫(待)	○			
俟(比)	○			
向				○
在	○	○	○	○
当				○
方				○
即	○			
先	○			
后	○			
尽				○
终	○	○	○	○
至于	○	○	○	○
以至				○
以就				○
自从				○

上表中的“○”代表有这样的用例，空白表示没有见到这样的用例。

同一个介词有不同的写法，这些写法也有其时代性。如从现有的出土先秦文献来看，“于”始见于殷商时代，而“於”始见于春秋时代，“乎”始见于战国时代。“于”由多到少，战国时代最少见；“於”由少到多，到了战国时代最常见；“乎”始终都不多见，它主要用来记录句末疑问语气词的。

同一个介词在不同的时代虽然都可以见到，但其使用频率却可以是不同的，也就是有常用和不常用之别。如介词“用”在西周时代已经产生了，当时已经有工具介词、材料

介词和因事介词等用法，比较常用。到了战国时代，介词“用”仍有这些用法，此外还发展出依据介词和时间介词等用法。不过在战国时代，由于介词“以”已经被广泛使用了，介词“用”就不常用了。

不但介词有时代性，就是介词的用法也具有时代性。我们都知道一个介词往往有多种用法，但是这些不同的用法往往不是在同一时代产生的，而是在不同时代逐渐发展出来的。

如“在”的处所/位事介词用法和时间介词用法从殷商时代起到战国秦代都存在，而范围介词用法只见于战国秦代。

又如介词“由”始见于殷商时代，当时只有用作时间介词的用法。到了战国秦代，介词“由”则出现了施事介词、方位介词、范围介词、原因介词等用法，只是都不太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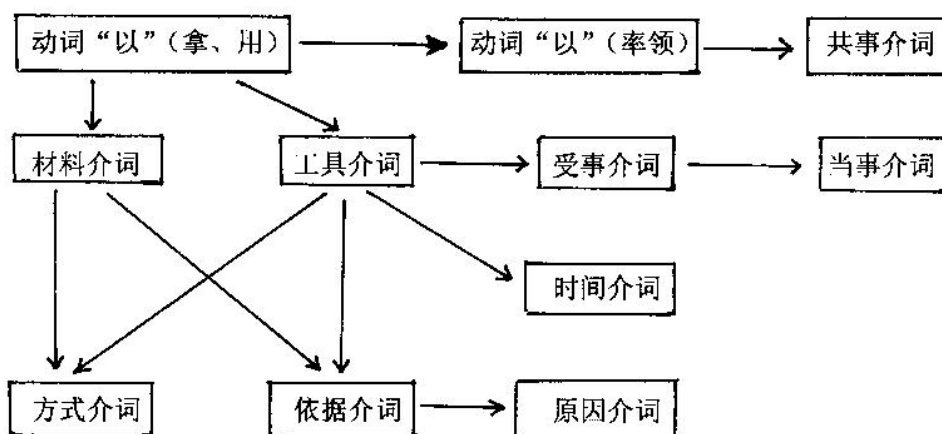
再如“以”在西周时代已经语法化为介词了，这个介词已经有工具介词、凭据介词、原因介词、共事介词和客事介词等用法。到了春秋时代，已经可以见到材料介词的用法。到了战国时代，继承了西周时代介词“以”的各种用法，同时又发展出当事介词、方式介词、时间介词等用法。

一个介词可以有多种用法，这不同用法之间是可以梳理出演变源流关系来的。这就是说一个介词内部的各种用法也构成一个系统，各个成员之间是有联系的。

如介词“以”，它的本义是提挈、携带之义。由此义引申有拿、用的意义。这种意义的“以”首先虚化为工具介词“以”。这种工具介词“以”的意义也是“拿”、“用”。动词“以”同时虚化为材料介词，材料介词“以”也是“拿、用”的意思。方式介词、依据介词显然是由工具介词、材料介词进一步虚化而来的。由后者向前者发展的动因，主要在于介词“以”引进内容的变化：工具介词、材料介词“以”一般是引进表示具体有形事物的名词语的，而方式介词、依据介词“以”一般引进的是抽象名词的，这个抽象名词用以表示完成动作行为所采取的方法、形式，所依据的标准、前提或基础。原因介词“以”应源自依据介词“以”。这两种“以”常常不易分辨，说明两者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受事介词“以”源自工具介词。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以”，还有用作当事介词的，这种“以”可能源自受事介词“以”，因为受事、当事，都是动词后的配价成分。当然，这种用法的“以”，也可能是受“於”类化而产生的。共事介词“以”，是由率领义的动词“以”虚化而来的。率领义的动词“以”在殷商时代已很常见，后来直接虚化为共事介词“以”。时间介词“以”情况复杂一点。解惠全等（1987）认为是源自“凭借”义的介词“以”，而周守晋（2004）则认为是源自工具介词。由于时间介词“以”常常可译为“用”，因而周守晋（2004）说可能更好一些。最初“以+表日名词”就是用这个日子干

什么的意思。但是不少时间介词“以”已经不能译为“用”，而可以译为“在”“到”或“从”了。这种变化，可以视为时间介词“以”意义的泛化（语法意义的泛化），也可以认为是时间介词“以”受到了时间介词“於”的类化。这两个词既然都可以引进时间词语，所以相互影响，时间介词“以”也可以跟“於”一样有“在、到、从”的意义。

介词“以”语义功能源流可用下表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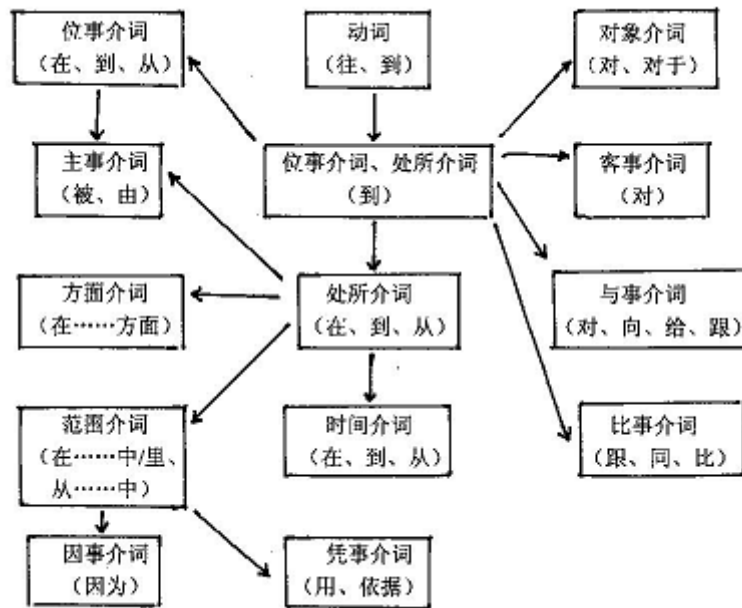


※ 当事介词、时间介词的发展，可能受到介词“於”的类化。

又如“于”，由“往、到”义的动词虚化为意义为“到”的**位事/处所介词**，这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作动词时，“于”的宾语都是处所词语，虚化为位事/处所介词后亦然。意义为“到”的位事/处所介词“于”**本来是终点介词**，后来，其语法意义泛化，不但作终点介词，也用作**所在介词和起点介词**。由“在、到、从”义的处所介词变为有“在、到、从”义的时间介词，这是由于隐喻的作用，由表空间义转为表时间义。“於”的**对象介词、客事介词、与事介词和比事介词等的用法**，都应该是由意义为“到”的位事/处所介词发展

而来的，因为“往、到”义跟“对、向、跟、给”义是相通的：往某个地方去其实就是向着/对着某个方向。**主事介词“於”**应源自位事/处所介词“於”。处所介词“於”是“在”“到”“从”的意思。由此义逐渐抽象化和泛化，引申为“在……中/里”、“从……中”，这样就变成了**范围介词**；由处所介词的意义引申为“在……方面”，就变成了**方面介词**。**因事介词、凭事介词**等用法其实都是源自范围介词。先看下引两例：(a)“余必使尔罢於奔命以死。”(《左传·成公七年》) (b)“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史记·淮阴侯列传》)前引(a)例中的“於”，何乐士(2006)认为可译为“由于”；(b)例中的“於”，何乐士(2006)认为可译为“根据”。其实，这两个“於”原来都是“在……中”的意思，只是由于“於”的宾语和前面动词的特定语义关系，使我们可以像何乐士(2006)那样翻译罢了。又如“辱于老夫”中的“于”，我们分析为原因介词，但也可以看成范围或处所介词，意思是“从……这里”。

我们认为介词“於”语义功能的发展应如下图所示：



介词用法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如“於（于）”是由位事/处所介词发展出时间介词，同时又发展出范围介词。不但“於（于）”如此，就是“在”“即”“当”“自”“从”等等都是如此。

又如原因介词“于”“於”来源于表示处所起点的介词“于”“於”；同样原因介词“由”也是源自表示起点的处所方位介词“由”。

两个词意义相同相近，所由虚化的具体句法环境相类，其用法的演变就可能是相同的。如“以”和“用”意义相同，两者用法的发展也类似。动词“用”首先虚化为工具介词和材料介词，由工具介词和材料介词再虚化为依据介词，由依据介词再进一步虚化为原因介词；由工具介词还发展出时间介词的用法。这跟“以”是一致的。

（三）探讨其发展的源头

如**出土先秦文献介词的起源**：

以往的观点是，介词主要是由动词语法化/虚化而来的，这种观点大抵是正确的。例如“在”“当”“由”“从”“至”“以”“用”“与”“及”“为”“眾（暨）”“先”等介词，都是源自动词的。

介词“于”亦然。关于介词“于”的来源，过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认为是由“往”义的动词“于”虚化而来的。持此说的有郭锡良（1997、2005）、王鸿滨（2004）、蒲立本（2006）、梅祖麟（2004）等。二、认为介词“于”“於”“乎”来源于上古的泛声。持此说的是赵仲邑（1964）。他看到了上古汉语介词“于”“於”“乎”跟“以”“与”“为”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可以根据来源把上古汉语的介词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即来源于泛声的介词和来源于动词的介词。三、认为介词“于”来源于远古汉语的格助词。持此说的是时兵（2003）。他认为原始汉语的语法基本格局与古藏语大体相同，都是SOV型语言，没有前置介词，而使用格助词标识体词性成分在句子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成分的关系。“于”的真正来源是远古汉语的格助词，它的语法功能与古藏语向格助词la大致相当。我们赞同第一种说法，因为在甲骨文中“于”有动词用法，而且不少见。例如“壬寅卜：王于商？”（《合集》33124）“贞：使人于岳？ | 贞：勿使人于岳？”（《合集》5520）“贞：令甗白于敦？”（《英国》1977）“贞：呼去

伯于冥？ | 贞：呼去伯于冥？”（《合集》635）

应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介词都源自动词，例如介词“方”应是源自副词“方”。

复音介词的来源就更复杂一些：介词“至于”的源头应是动词“至”+介词“于”；介词“以至”的源头应是连词“以”+动词“至”；介词“以就”的源头应是连词“以”+动词“就”；介词“自从”的源头应是介词“自”和“从”的并列。

我们不但要知道介词绝大多数是源于动词的，还要进一步研究介词是从动词的哪个义项而来的。如关于介词“与”的来源，周生亚（1989）曾指出，“与”原来是一个意义为给予的动词，由此虚化为虚词。虚词“与”产生的路线应为动词→介词→连词。于江（1996）也认为虚词“与”来源于给予义的动词。这种动词后面通常带上动作的对象，后来逐渐虚化，而成为表示“为、替、和”等意义的介词、连词。**而我们认为，**介词“与”确实是来源于动词“与”，但并不是来源于“给予”义的动词，而是来源于“跟随”、“在一起”义的动词。这种意义的动词“与”在古汉语中是存在的，例如“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国语·齐语》）“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王力等（2000）认为，前例中的“与”为“跟随”、“亲附”义，后例中的“与”为“在一起”的意思。

介词的源头与介词的特点：

考察汉语介词时应注意对其源头的探究，因为一个介词的源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介词在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上的特点。

比如介词“与”所由虚化的具体语法环境为“NP₁+与+NP₂+VP”这样的连动式，“NP₁”和“NP₂”一般是表人名词语。所以“与”字介宾短语（不管介词“与”的宾语是否省略）都出现在谓词语前作状语，没有例外。

介词“方”是源自副词“方”的，所以介词“方”的宾语最初都是动词语，后来它才可以用名词语为宾语。

介词往往是由动词的某一义项发展而来的，这一义项一般就是介词后来语法化的语义基础和起点。如动词“以”的本义是提挈、携带之义，由此义引申有拿、用的意义。这种意义的“以”首先虚化为工具介词“以”。这种工具介词“以”的意义也是“拿”、“用”，用什么工具做什么事，也就是拿着这个工具。意义是“拿、用”的动词“以”同时虚化为材料介词，材料介词“以”也是“拿、用”的意思，用什么材料做什么，也就是拿着这个材料。介词“以”的其他用法，大都是在工具介词、材料介词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四）研究发展的机制

解释动词虚化为介词的机制：

动词虚化为介词的基本前提是它经常出现在某种句法结构的位置上。一个动词如果经常出现在“□+O+VP”或“VP+

□+O”中“□”的位置上就可能语法化为介词。

例如介词“在”所由虚化的具体句法环境应是“在+处所词语+VP”和“VP+在+处所词语”；“当”所由虚化的具体句法环境应该是“当+NP+VP”；“由”“从”所由虚化的具体句法环境是“由/从+O+VP”；“以”所由虚化的具体的句法环境是“以”作前一个动词的连谓结构；“与”所由虚化的具体语法环境应为“NP₁+与+NP₂+VP”这样的连动式；“为”所由虚化的具体语法环境是“S+为+名₁/代+名₂/动”；动词“及”虚化为介词“及”的句法结构位置应是“及”和它的宾语出现在“VP”之前；介词“于”是由连动式“V₁V₂O”中的“V₂”变来的，等等。

我们知道，汉语句子结构信息的安排，一般是旧信息或已知信息在前面，新信息或焦点在后面。这样汉语连动式中第一个动词所表示的往往是旧信息或已知信息，其本身是表示伴随意义的，后一个动词才是句子的中心。由于第一个动词经常作为非中心动词来用，它的意义开始变弱，开始虚化，逐渐失去动词的性质，变成一个只起介引作用的介词。处于连动式后一动词位置上的某些动词，由于语音的弱化，词义的抽象化，也有可能虚化为介词。

句法位置的变化是前提，而要实现这种虚化还需要动词词义的变化。一个动词经常表示伴随动作，就会引起动词词义的弱化、泛化和虚化。以“用”为例，当它作动词的时候，

其后宾语所表示的事物往往是具体的事物，例如“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诗经·召南·采芣》）“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孟子·梁惠王上》）但当它向介词虚化时，后面宾语所表示的就可以是抽象事物了。例如“伯赐赏，用作宝簋。”（《生史簋铭》，《集成》7·4100）“赐贝百朋，伯姜对扬天子休，用作宝尊彝。”（《伯姜鼎铭》，《集成》5·2791）“若敬乃正，勿法（废）朕令，孟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大孟鼎铭》，《集成》5·2837）语法化后的介词所带的宾语比作为动词所带的宾语在意义类型上多样化了。以“用”为例，它由动词首先虚化为工具介词和材料介词，由工具介词和材料介词再虚化为依据介词，由依据介词再进一步虚化为原因介词，还由工具介词发展出时间介词的用法。

在由动词向介词语法化的过程中，在汉语中早已存在“P+NP+VP”和“VP+P+NP”这样的句式，成了虚化的类推源动力。句法位置的变化和固定，动词词义的弱化、泛化和虚化，这些变化在类推源动力的作用下得以强化，引起了人们对它所在结构的重新分析。“V+O+VP”和“VP+V+O”被分析为“P+NP+VP”和“VP+P+NP”这样的结构，从而完成了由动词向介词的转变。

（五）研究发展的原因与规律

历时研究：在断代描写的基础上从宏观系统和微观个体

两个方面考察出土上古文献中虚词的演化；探究其起源及消亡；追踪其词性、意义和用法等方面的变化；研究虚词的地域性及共同语和方言等问题；寻找其演化的动因；总结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及方向。

先秦文献介词发展的原因和规律：

介词由殷商时代到战国秦代的发展，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是时代因素。从殷商到战国秦代，历时较长，语言必然会有变化，因为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前面已经说过，出土先秦文献中介词的历时演变是多方面的，如词本身的、使用频率的、书写形式的、用法的等等。

其次是地域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介词上。如有些介词只出现在秦简之中，有些介词只出现在楚简里；介词的书写形式也有地域性，介词框架也具有地域性。

再次是思维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维逐渐精密。思维的精密化，就要求语言能更精确地表达人们的思想。相应地，就要求句子结构更加复杂和多变。而这正是介词发展的重要动因。句子越复杂，核心动词跟相关句法语义成分的关系越多样，动词对一些句法语义成分的控制就越弱，这样为了明确一些句法语义成分跟核心动词的关系，就要使用介词来介引。

最后是语言因素。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动词，当它们具备

一定的条件时，就会向介词进行转化。介词转化出来后，就有一个跟动词竞争的问题。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动词完全失去了动词的意义和功能，成为一个地道的介词；也可能是动词与介词长期共存，形成动介兼类词。前面说过，由动词向介词的语法化，是有规律性的。如两个词意义相同相近，其用法的演变就可能是相同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些同义介词，这些同义介词之间也会有竞争，最终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如介词“以”和“用”竞争的结果是“以”取得胜利。

出土先秦文献介词发展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出土先秦文献中的介词一般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不但上古汉语中的介词是如此，就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多数也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现代汉语各方言中的介词绝大多数也都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许多介词都有同形的动词用法。看来这是汉语介词来源的一般规律。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介词“方”是由副词发展而来的。如前所述，复音介词的来源就更复杂一些。

2.从殷商时代到战国秦代汉语介词的数量是越来越多。由前表来看，在殷商时代有介词“於（于、乎）、及、眾（暨）、自、从、由、至、戢（待）、邛（比）、在、即、先、后、卒、终、至于”等，到了西周春秋时代又增加了“以、用、晋”等，到了战国时代又增加了“如、与、为、因、道、到、逕、向、当、方、尽、以至、以就、自从”等。

3.介词所介引的语义成分的类型越来越丰富。就虚词的子系统来说，殷商时代还没有介引凭事、因事、比事的介词，后来介引这些语义成分的介词就逐渐产生了。就一个具体介词而言，其所介引的语义成分也是越来越丰富的，如介词“及”在殷商时代主要用作条件介词；在西周时代，介词“及”主要是用作共事介词；到了战国时代，介词“及”的用法多样化了，可以作共事介词、时间介词、对象介词、方面介词、条件介词等。这样一来，介词就可以介引多种句法成分和语义成分，使汉语句子的句法语义结构更加严密、细致和复杂。

4. 同义介词是越来越多。殷商时代同义介词还不多，到了战国秦代则明显增多。如共事介词不但有“於（于、乎）”，还有“与、及、以”；当事介词，不但有“於（于、乎）”，还有“为、以、以就”；原因介词有“以、用、为、因、由”；依据介词有“以、用、因”等等。这些同义介词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可以用来精细地表达人们的思想，这也是语言走向精密化的一个表现。

5.介词框架已开始出现。随着方位词的发展，以介词为前置词、而以方位词为后置词的介词框架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并且有了较快的发展。如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以上”、“以下”、“以西”、“以东”、“以南”、“以北”、“以来”、“以逾”等方位词，可以跟介词构成如下介词框架：自……以上、自……以下、自……以西、从……以南、从……以北、自……

以来等等，表达特定的句法语义关系。不同的介词也可以构成一些介词框架，这种例子在甲骨文中已经可以见到，如“自……至于……”。到后来这种介词框架就更为复杂多样，如战国时代有“自……以至……”、“从……以至……”、“自……以就……”等，这些框架在其它时代的文献中是见不到的。

6.在介词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新陈代谢规律。如共事介词在殷商和西周时代主要用“𠄎（暨）”，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它就基本消亡了，代之而起经常使用的是介词“与”。西周时代的原因介词主要用“用”，但到了战国时代，原因介词主要用“以”，介词“用”很少使用了。即使是书写形式，也体现出新陈代谢的规律，如介词“於（于、乎）”，最初用“于”，后来用“於”。

（六）研究其因地而异的状况

出土先秦文献介词的地域性：

从出土战国文献来看，有些介词只出现在秦简之中，有些介词只出现在楚简里。只出现在秦简之中的介词如“到”“逯”“道”等，只出现在楚简里的介词如“因”“由”等。而介词“与”在秦简、楚简中都常见，在中山国金文中也可以见到，但在曾简中一次也见不到。这是由于介词“与”没机会出现呢，还是由于当地人不用介词“与”呢？这是值得以后研究的问题。

介词的书写形式也有地域性。如“乎”这种写法只有客事介词、与事介词、关事介词和比事介词等四种用法，而且它只出现在楚简之中。

介词框架也具有地域性。如“主语+之+在+处所名词+也”或“其+在+处所名词+（也）”这样的框架，只见于曾国金文里。例如“妥宾之在楚也为坪皇，其在申也为暹（夷）则。”

（《曾侯乙钟铭》，《集成》2·327）“大（太）族（簇）之在周也为刺（厉）音，其在晋也为𦉑钟。”（《曾侯乙钟铭》，《集成》2·322）“宣钟之在晋也为六墉。”（《曾侯乙钟铭》，《集成》2·293）“穆音之在楚为穆钟，其在周为刺（厉）音。”

（《曾侯乙钟铭》，《集成》2·738）又如“当……（也）”这种框架，只见于楚简之中。例如“堂（当）是时也，𦉑（疒）役（疫）不至，祆（妖）𦉑（祥）不行。”（《上博楚简二·容成氏》）“古（故）堂（当）是𦉑（时）也，亡并𦉑。”（《上博楚简二·容成氏》）“堂（当）是𦉑（时），𦉑（强）溺（弱）不𦉑（辞）𦉑（扬）。”（《上博楚简二·容成氏》）

四、历时研究的理论方法

（一）普方古结合的方法：汉语语法南粤论坛

（二）汉语史研究的多重证据法：

董志翘：《汉语史研究与多重证据法》：

一是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与国外之故书的相互印证
二是传世文献与出土的无文字考古材料的相互印证
三是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与田野调查、方言材料的相互印证

四是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及相关异域语料的相互印证

（三）适合历史研究的语言学理论

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语法化理论、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语言类型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

语法化的理论：

[美]鲍尔·J·霍伯尔等《语法化学说》（第二版），梁银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 定义

（1）沈家煊给语法化的定义是：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

（2）刘坚等的定义如下：通常是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

(3) 马壮寰认为，语法演化是单向的，即从实词向虚词、向语法形式和结构发展，而不是相反。语法形式的演进是从语法化程度较低的变为程度较高的，从开放类变为封闭类，从具体变为抽象。

(4) 杨成虎的定义更为简洁，即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成分的一种现象，是实词虚化为语法标记的过程。

语法化实际就是指词义抽象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引起词义虚化，使之最终失去原有的词汇意义，变成只表示语法关系或语法功能的语法单位。借以使词汇项和结构进入某种语言环境以表示语法功能的演变，一旦这些词汇项和结构发生了语法化，它们继续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

语法化有两层含义：（1）作为一种用来解释语言现象的研究框架，语法化指关于语言演变研究的部分（如：词汇项和结构是如何进入某种语境来表示语法功能的？语法项是如何发展出语法功能的？）（2）作为一个涉及实际语言现象本身的术语，语法化指借以使特殊项因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具语法性的演变步骤。

2. 溯源

语法化研究最早始于中国。

Harbsmeier 认为，“语法化”的概念在中国 13 世纪就提出来了，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称为“实词虚化”。元朝的

周伯琦在《六书正伪》中说：“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其实，关于虚化的概念的提出应早于13世纪。11世纪的宋代已有虚字之说。周辉《清波杂志》卷七就有“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而实字少”的记载。清代袁仁林的《虚字说》是我国古代对实词虚化研究较为深入的一部著作。

3. 分类

一般说来，语法化现象至少应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实词虚化、句法化现象、词汇化现象。

实词虚化：

实词虚化三种情况中，实词虚化是最基本的、最常见的，因而有被误解为语法化概念本身的倾向。实词虚化的实质就是某个词新的词类语法功能的获得，或者说从一个语义域的成员化为另一个语义域的成员。

句法化：

句法化现象即章法成分向句法成分的转变，语用因素规约后向语法因素过渡以及词序在实际使用中被凝固化从而表达某一具体语法功能等转变过程。

例如：看似不规则的语言现象“被+xx”完全可由现有的语法规则推导出来：“被+xx”来源于两类不同的被动句式，“被+xx”的句法化诱发了“被+xx”的词汇化，“被+xx”的词汇化使得部分“被+xx”成为词（“被xx”）而进入词库。

词汇化：

词汇化现象指的是引起词语表达 (lexical expression) 失去其直接性和透明度, 进而演化成不能从字面意思推测出其真正意义的词组。

例如: 近年来出现了“被就业”、“被幸福”、“被捐款”、“被高速”式的语言现象“被+XX”。

4. 机制

前面讲过。

5. 著作举例

马贝加《汉语动词语法化》(上、下), 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四) 历史语法学理论

[美]屈承熹《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